



张 军 著

书里书外的 经济学

SIXIANG LIUYEDAO
SHULI SHUWAI DE JINGJIXUE
ZHANG JUN ZHU

上海三联书店



张 军 著

书里书外的 经济学

SIXIANG LIUYEDAO
SHULI SHUWAI DE JINGJIXUE
ZHANG JUN ZHU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书里书外的经济学/张军著,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2. 12

ISBN 7-5426-1741-9

I. 书… II. 张… III. 经济学—文集 IV. F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4591 号

书里书外的经济学

著 者/ 张 军

策 划/ 曹 晋

责任编辑/ 黄 韬

封面设计/ 范蛸青

版式设计/ 鲁继德

监 制/ 沈 鹰

责任校对/ 张大伟

出版发行/ 上海三联书店

(200235)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http://www.sanlianc.com>

E-mail: sanlianc@online.sh.cn

印 刷/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

版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935×640 1/16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17.5

印 数/ 1—5100

ISBN7-5426-1741-9

F·366 定价: 28.00 元

序言：经济学的思之诗（韦森） / 1
“体制”不再的浙江 / 4
民间力量 / 8
走出“体制” / 12
民间力量与乡村企业的变迁 / 17
陆家嘴的阴影 / 26
脚手架绑起来的经济 / 29
建筑速度的经济学 / 33
再话“增长” / 38
中国行将崩溃？ / 42
为什么还不信中国的GDP？ / 46
世界工厂抑或世界市场？ / 50
“外资奇迹”的神话 / 57
刀刃上的增长 / 61
夸大了的省际贸易壁垒 / 65
“借贷”的风险 / 72
职工持股和股份合作制企业刍议 / 77
“斯密定理”与中国企业的效率改进 / 80
“大型企业”为什么表现不凡？ / 85
能力与动力 / 90
“造假”与利润误区 / 94
经济发展中的价值观 / 98
关于制度创新与经济增长的闲话 / 105
管理者批判 / 110
经济学家眼中的企业家精神 / 117
由“资金黑洞”引起的思考 / 124
“脱困”拖垮证券市场 / 127
什么是“贫富”？
——从财富分配看收入分配 / 131
能否再“安然”一些？ / 137
谁决定“研发密度”？ / 141

从剑桥到芝加哥/144	
社会科学和达尔文主义/155	
倒霉的塔洛克与幸运的寻租经济学/160	
做经济解释的弄潮儿/166	
道德与博弈论/181	
博弈论与合作组织理论	
——《合作团队的经济学：一个文献综述》前言/188	
蟋蟀与洗衣粉	
——我们的世界为何五彩缤纷？/194	
什么是腐败？/198	
创造着市场的企业	
——《市场的微观结构》译者前言/205	
什么是有效的经济制度？	
——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教授的对话/214	
“科斯研究所”制度分析研讨班记事/221	
与《法和经济学》的一段“亲密接触”/230	
“像经济学家那样思考吧”	
——再读《公共问题经济学》/236	
跟进经济学家	
——读《青年经济学家指南》/241	
中国经济学家的选择	
——再读《中国制度变迁的案迁研究(第1集)》/247	
青木与CIA/252	
我认识的大卫	
——《中国的开放经济》(中文版)后记/257	
点评“红包”/261	
谁需要“诚信”？/263	
在世界杯的日子里/266	
在“体制外”增长	
——《现代经济学工作室·作品第1号：转轨与增长》序言/269	
京城的经济学家/275	

序言：经济学的思之诗

张军即出自己的第三本经济学随笔集，从韩国发来“伊魅尔”(email)，盛情邀我做序，自备感荣幸，当欣然从命。张军与我，是同事，更是契友。近些年来，我和张军交流蛮多。我的文章做出来，总喜欢先发给张军评点一下，然后再投传出去。张军的一些随笔写出来，也常常先传给我，听听我的意见。结果，我们俩对对方的新近研究和学理思路，均熟知。

说起来，在开启各自经济学理论思考的起点上，我和张军也大致重合。20世纪90年代初，我与张军还未曾谋面，但在经济理论研究兴趣上，我们就大致相契了。那时，我还在澳洲。张军则时在上海，时在美国，时在英国。在那个时段中，我们的研究兴趣，基本上都是新制度经济学和比较经济学，所关注的理论凝聚点，也主要是产权经济学。

90年代末回国后，我沿着经济学的思辨思维进路，越走越“僻”，越思越“玄”：从诺思、科斯到哈耶克，从维特根斯坦、康德到休谟；从法理学、人类学到伦理学，从分析哲学、语言哲学又到语言学。而张军则在国内外许多著名学府讲学、游学的同时，在中国经济改革和增长的丰厚实践中，比较关注起体制、制度和增长的现实和真实问题来了。研究进路的不同，观察世界的视角不同，并未成为我们交流的阻隔。尤其是在写经济学随笔和专栏文章时，我们又走到了一起。在相互鼓励中，我们结伴而行，且走着同一条路，进行着差不多同一类的理论思考。

张军近年很忙。作为一位中国的著名经济学家，作

为复旦大学的名教授，尤其是作为我们复旦经济学院的副院长，教学事、行政事、应酬事、孩子教育事，还有那无孔不入的媒体随时打扰……这些加起来，也可真够张军应对的。能在闹中求静，忙中偷闲，坐得下来，沉得下心来，敲得下笔记本电脑的键来，写得出既有学术见底、又有实践意义的经济学理论随笔，这可不简单！这是天赋，是意志，是追求，是执着，也有常人所做不来的功夫。

我喜欢读张军的经济学随笔。张军的经济学随笔，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激昂的高调，平和中见功夫，自然中见思想，真实中见理论。这就是张军的随笔，张军的追求，也是张军的风格。我喜欢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也喜欢英国的乡村，故常在梦中回到剑桥附近的小村子“格兰切斯特”(Grantchester)。在格兰切斯特，有逢春花绽树的著名“果园”(the Orchard)。在“果园”中，有那数不清的在人类历史上载名的学者、诗人、科学家和思想家曾在其中吃茶论道的古咖啡屋。园中，树下，屋内，还置放着经济学家凯恩斯、哈耶克曾坐过的椅子，好像还有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足印、诗人拜伦的身影。那片田野，那块果园，那古老的咖啡屋，梦中景，景中梦。不知怎的，从剑桥回沪已年余，每当我读张军的随笔，心弦中好像就谱起了贝多芬“田园”的清新旋律，脑海里即浮现出了英国乡村的美景，自己好像又回到了剑桥附近的格兰切斯特。张军曾说，英格兰也有着他挥之不去的情感。

自然中有诗，生活中有诗，语言中有诗，经济理论中也有诗。上帝以诗(言)创世，并以静美和谐之诗，“绽”现存在。存在在语言中即为诗，思之诗在文字语言中即为书。书在诗中，诗在书中，诗和书均在自然中。

于是，美在自然，美在平和，美亦在经济思想之中。

中国的经济学，已开始起步。中国的经济学人，亦开启了自己的独立思考。路在延伸，理论在发展；张军在写着自己的经济学随笔，在写着经济学的思之诗。

谨为序。

韦 森

2002年10月28日晨谨识于复旦

“体制”不再的浙江

自从我1996年第一次去温州了解民间金融的发展，几乎每年都多次到浙江走访或者参加学术活动。只是这两年去温州的次数少了许多，但我在上海的公寓里住着不少的温州人，也经常听到温州人的故事。记得2000年的什么时候温州主办一个关于新世纪经济发展的论坛，邀请我做嘉宾演讲，但我可能是因为即将去美国而谢绝了。可是，去年秋，我刚从美国回来接到的第一个邀请函便是温州经济开发区的，函上说，他们很希望我能到那里做一个报告。可是我终究因为脱不开身而不得不放弃这个交流的机会。不过，不久就有另一个电话找到我，问我是否能在上海为温州的一个商会做一个点评经济形势的报告，这一次，我去了。

说来也巧，在美国休假两个月刚回到上海之后，我接到的第一个邀请讲学的还是来自温州的。这一次的邀请方是温州市委党校。遗憾的是，我已接受了韩国庆北国立大学的讲学邀请，只能暂时推迟去温州的计划了。但我总是觉得，温州是不可不去的，浙江的经济越来越有看头了。当然，除了温州，浙江还有很多可以体察其经济发展特色的地方。

上周末，借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在宁波开工作会之机，我终于再临三江口岸。很多年前，宁波的经济虽有变化，但毕竟还不那么耀眼。但这几年，凡是到过宁波的人都惊讶地发现宁波的经济和城市面貌发生了意料不到的大的变化，就好像10年前人们到上海的那种印象一样。第二天晚上，我与两位地方官员坐在一起吃晚饭，聊起宁波经济的发展。他们说，宁波的经济发展（包括城

我总是觉得，温州是不可不去的，浙江的经济越来越有看头了。

市面貌)之所以跃上了更高的、良性的阶段,主要还是得益于“体制”的彻底转换。这样的话,比起早些年在人们当中流传的所谓“一靠政策、二靠机遇,三靠北伦港”的戏言 可谓更实在了。

诚如他们自己人所说,这些年来,浙江的经济活力就主要是体制的转换所换得的。这与东北地区、上海和广东的经济发展的机制就又不太相同了。东北的经济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苏联型经济,它造就了至少两代人的文化和行为方式。要改变这样的经济面貌的确是比较困难的。而上海和广东的经济发展看上去则依赖了较大比重的外资流入,与东南亚地区(而不是东亚地区的“四小龙”)的经济发展模式有着较强的相似性。但据我所知,浙江的经济发展,外资的利用并不是那么的重要。例如在宁波,虽然在一些机械和港运行业等也有外资的成分,但总体而言,外资在资本形成中所占的比重还是非常的低,占一成罢了。

相对于东北、上海或广东而言,浙江的经济发展主要是靠了本土的民间力量,也就是靠了民营企业家的创业并由此真正靠了市场的力量而不是政府的力量。对市场的发现和追逐看起来对浙江经济的发展比在中国的其他地区显得更为重要。虽然浙江的大企业并不多,但是“大市场”几乎都在浙江。企业家与市场的互动造就了浙江经济今天的效率。

有意思的是,为什么浙江能够在“解放”民间生产力方面走在前面呢?我向一位在宁波市委工作的官员进一步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而他直截了当地回答说,因为他们很早就将国有企业民营化了,只保留了少数几个所谓“战略性行业”的国有制。这正好验证了我这些年来一直倡导的观点:没有了国有企业,民间的企业家就不再边缘化了。而

这些年来,浙江的经济活力就主要是体制的转换所换得的。

相对于东北、上海或广东而言,浙江的经济发展主要是靠了本土的民间力量,也就是靠了民营企业家的创业并由此真正靠了市场的力量而不是政府的力量。对市场的发现和追逐看起来对浙江经济的发展比在中国的其他地区显得更为重要。

没有了国有企业,民间的企业家就不再边缘化了。

这样的回答也让我开始思考我们经济学家曾经一再坚持的关于民营化改革的思想。似乎到了浙江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我们要充分重视民营化在体制转型中的重要作用。

一说到“体制”，我们几乎都能理解它的含义。简单地讲，它是一种纵向集中的权力结构。你在这个结构内，你就事实上还得听从“上面的”或者听从领导人的。我们所说的体制当然与我们建国以后实行的计划经济有密不可分的关联。但是，虽然现在经济的计划化已经被改革了，计划的程度也几乎降到了零，但是由于政府的权力来源和权力结构并未彻底变革，政府和政府官员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力还在，而且很多经济活动的最终决策权还是在政府那里或者官员的手里。例如，政府审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政府那里，现有的大多数部门事实上都是为审批经济而设立和存在的。只要这些负责审批的所谓“主管部门”还存在着，经济活动的最终决策就还是由这些主管部门以及政府的主要领导人说了算。前不久，我在旧金山机场遇到一位在江苏某地方政府的经委工作的年轻的官员，他私下对我说，在美国学习一年的最大收获就是明白了自己过去所做的审批工作是多么的无谓。于是，他决定回去以后就辞掉在政府主管部门的工作而去创办自己的事业。

不过，在制度上，中国的政府主管部门对经济的管制惯性通常只是面对国有部门的，也就是说，现有的管制条例大多数基本上还是针对国有部门而制定的。有了大量的国有企业，政府主管部门的管制就有了合法性的基础。因此，要彻底摆脱政府主管部门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就必须真正缩小国有企业的数量范围。在浙江，地方的官员也都承认，国有企业卖得快也卖得早是他们的经济体制能够尽早获得转换的前提。今天，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在

虽然现在经济的计划化已经被改革了，计划的程度也几乎降到了零，但是由于政府的权力来源和权力结构并未彻底变革，政府和政府官员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力还在，而且很多经济活动的最终决策权还是在政府那里或者官员的手里。

要彻底摆脱政府主管部门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就必须真正缩小国有企业的数量范围。

我们这里，可以说已经没有了国有企业。因为国有企业已微不足道，自然就不再面临诸如下岗失业或者解困一类的让其他地方政府伤透脑筋的国有企业的问题。在这种前提下，真正需要改革的已经不是经济而是政府部门自己了。如何将政府的职能从管制和审批经济转变到服务和保护企业家的经济活动不再是理论上的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选择。在宁波，你总是可以听到人们对政府职能发生这样转变的首肯。

今年以来，我也多次去过苏南和山东，同样，那里的经济发展也正在更多地依赖民间企业家的创造力和创业精神。企业家成了经济发展的主角。体制的变革正在创造出有活力的经济部门。而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进程在这些地区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浙江、江苏和山东地区的经济增长及效率让我相信，经济不能发展的地方，不是政府无能，而是政府太强大，不是政府对经济不善管理，而是过度管制。

因为国有企业已微不足道，自然就不再面临诸如下岗失业或者解困一类的让其他地方政府伤透脑筋的国有企业的问题。在这种前提下，真正需要改革的已经不是经济而是政府部门自己了。

经济不能发展的地方，不是政府无能，而是政府太强大，不是政府对经济不善管理，而是过度管制。

民间力量

一部在新千年正式生效的《个人独资企业法》，引起了国人的广泛关注，回头想想，我们好像还没有一部法律像《个人独资企业法》这样“浪漫”过：“花一元钱办企业”、“花一元钱当老板”的醒目标题到处可见，“炒”得风风火火。

花一元钱真的可以做老板？

在《中国经济时报》上，有人写下了这样的话：“新年到了，你有什么新的打算吗？如果你不想继续给人打工，如果你发现了一个商机，并且想检验一下自己的能力和运气，那么你可以在新千年的第一个元旦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去工商局注册一家属于你自己的个人独资企业，你无需犯难，因为只需一元注册资本金。”

《文汇报》1月14日提供的消息说，有关部门“从新年的第一个工作日开始，平均每天都有近50位市民来电，咨询的都是一个问题：怎样花一元钱办家个人独资企业？花一元钱真的能当老板？”

法学专家解释说，“花一元钱当老板”只是一个形象化的说法。《个人独资企业法》没有对注册企业的资本规定“底线”，这与1994年生效的《企业法》有根本的不同。《企业法》规定的公司注册资本最低也要10万元（指咨询服务型公司）。显然，《个人独资企业法》的本意是降低企业创办的“门槛”，让更多的个人投资创业当老板。

有学者认为，《个人独资企业法》的颁布为我国三千多万“个体户”申报“正式户口”提供了法律依据；有

“花一元钱当老板”
只是一个形象化的说法。

《个人独资企业法》
的本意是降低企业创
办的“门槛”，让更多的
个人投资创业当老板。

的专家甚至说,取消注册资金限制是对“穷人”投资权利的尊重和保护,有助于改变只有“富人”才能当老板的陈规陋习。

光荣不再是梦想

无论怎样,这该是千禧年最值得玩味的“新闻”。作为经济学家,我从《个人独资企业法》的诞生中看到,启动蕴藏在我们这个经济中的“民间力量”的时代已经到来。对上了年纪的中国人来说,能有这样的时代可是意味深长的,这是光荣与不再梦想的个人创业时代。

我又想起了四年前曾翻译过的那本书《改变世界的位男性》,书中非常苛刻地遴选并研究了十三位创业家。他们的企业家才能或创业精神改变了我们的世界,也从根本上影响了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

这些企业家包括盖茨、特纳、毕奇、布什内尔、海德等。尽管他们的个人故事富有传奇色彩,但让经济学家感兴趣的却是他们的分布。不管他们从事的行业有什么不同,有一点却是共同的,他们均来自于民间,特别是,他们根本不是已有大型企业(如IBM、GM等)的高级管理人员。《改变世界的十三位男性》一书的作者兰德勒姆的书中写道:“为什么每一个突破性概念都是初入门道的创业家而不是行业的大人物创造的呢?研究发现,在几乎每一个行业或职业里都是如此。”

我在《万科》周刊上曾提出过这样一个论点,简单地说,相对于官办企业来说,我更相信民间企业才可能是“企业家的企业”。事实上,即使在五百强咄咄逼人的世界上,大量的民间小企业始终是技术和制度创新的主角。我们看到的这些企业家,无论他们处于什么时代和什么经济

我从《个人独资企业法》的诞生中看到,启动蕴藏在我们这个经济中的“民间力量”的时代已经到来。

不管他们从事的行业有什么不同,有一点却是共同的,他们均来自于民间,特别是,他们根本不是已有大型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

相对于官办企业来说,我更相信民间企业才可能是“企业家的企业”。事实上,即使在五百强咄咄逼人的世界上,大量的民间小企业始终是技术和制度创新的主角。

中，都有创业的历史，都和自己创办的企业联系在一起。这决不是偶然的。

在“麦当劳”召开的“董事会”

企业家精神，作为一种能力，是纯粹的“民间信息”，要事先甄别企业家才能（也就是把真正的企业家与滥竽充数者区别开来）是非常困难的。

因此，一个“按质论价”的企业家市场是不会存在的。在所谓的企业家市场上购买企业家才能就好像一个人走进了次品市场。所以，从逻辑上说，企业家不是可以通过市场来找到的。

相反，因为市场无法甄别企业家和企业家才能，所以，成为企业家是企业家自己甄别自己的结果。更准确地说，是企业家对自己的选择。这，就是创办和拥有自己的企业。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民营企业。

通过创办企业，潜在的企业家真正成了企业家，实现了“自我甄别”。因为一个人的企业家才能和他（她）的财富多少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所以，一个有企业家才能但贫穷的人不能当老板对社会来说是极其不利的，而当个人“自我甄别”的选择受到限制时（如，注册资金的门槛过高或以官办企业取代民间企业），这个经济中的企业家能力必将受到抑制。

在中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的诞生实际上解除了个人实现“自我甄别”的限制，它必将使我们民间的企业家精神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扬。如果回顾一下我们经济当中的诸多“亮点”，那么我们应该多少能感受到“民间”的力量。民间的力量不仅造就了我们今天的一批非常有活力的企业家型的大企业海尔、康佳和长虹，而且

成为企业家是企业家自己甄别自己的结果。更准确地说，是企业家对自己的选择。

一个有企业家才能但贫穷的人不能当老板对社会来说是极其不利的，而当个人“自我甄别”的选择受到限制时，这个经济中的企业家能力必将受到抑制。

《个人独资企业法》的诞生实际上解除了个人实现“自我甄别”的限制，它必将使我们民间的企业家精神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扬。

造就了我们的科技“中关村”。民间的力量不仅使乡镇企业在中国蓬勃发展,而且使以温州为代表的私营企业得以壮大。

事实上,把民间力量与高科技高成长型企业联系在一起,也更具现实意义。知识、技术和企业家精神的更好结合正在创造出超乎我们想象的巨大财富。然而,这种创新和创业的能力是一个十足的“民间信息”。他并不必然来自于官办的科研院所。上海科学院的一位副院长曾感叹说,我们几千人的科研规模所创造的市场财富还不足复旦四位学生创造的二十分之一。其实,这毫不奇怪。

当有一天我们看到大学生在自己的寝室里经营着上亿的资产,在“麦当劳”召开着“董事会”的时候,我们就会真正懂得“民间力量”的含义。

知识、技术和企业家精神的更好结合正在创造出超乎我们想象的巨大财富。

走出“体制”

一份取名《当代中国报告》的学术杂志即将在上海诞生。在出版者的多次请求下，我答应担当创刊号的“主题研讨”的主持人。这意味着我要在刊物上组织一个学术研讨会。这当然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光确定主题就很够呛了，更不用说邀请著名人士参加这个研讨的难度了。不过，我做事情总喜欢与众不同。换个思路想问题总是会有惊人的出路。一天我无意中从我的学生口中得知，我的一些朋友有的在对家族企业进行“田野调查”，有的在关注民间金融，而有的则在对乡村企业的改制进行着社会学分析。如果再加上我这些天对企业家精神的思考，一个完整的思路就这样浮出水面了。于是我决定把这些研究力量召集在一块，研讨主题就叫“民间力量”。嘿！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这已是我第二次为“民间力量”这个概念做脚注了。两年前，我在哈佛写就的关于企业家精神的小书就取名为“民间力量”，但出版商的编审最后还是决定删掉这个词，用我原来的副标题改为正题。据说，删掉这个词的主要原因是定义不详，而在我看来，这正是我选择这个词的动机。以我之见，民间力量这个词就是可以考验你的想象力。写到这里，我又忍不住想起这些年来周围发生的一些事来。

作为一个著作人，我经常与出版社打交道。在中国，出版社尽是些国有企业。在我知道的一家北京的出版社里确实（碰巧）有一些很不错的编辑和美编，也确实出版过一些有品位的书。但由于国有企业的体制毛病，

以我之见，民间力量这个词就是可以考验你的想象力。